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WENXIAN CHUANCHENG YU SHIXUE YANJIU

文献传承与史学研究

周少川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文献传承与史学研究

周少川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献传承与史学研究 / 周少川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3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ISBN 978-7-303-12026-0

I. ①文… II. ①周… III. ①史籍—文献学—中国—文集
②史学史—中国—文集 IV. ①G257.35-53 ②K09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5760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30 mm

印张: 21

字数: 315 千字

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策划编辑: 李雪洁 责任编辑: 郭瑜 李雪洁

美术编辑: 毛佳 装帧设计: 毛佳

责任校对: 李茵 责任印制: 李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何兹全 龚书铎 刘家和 瞿林东 陈其泰
郑师渠 晁福林

主 任 杨共乐

副主任 李 帆 易 宁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卫东 王开玺 王冠英 宁 欣 汝企和
张 皓 张 越 张荣强 张建华 郑 林
侯树栋 耿向东 梅雪芹

出版说明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家“211”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科研实力颇为雄厚，在学术界声誉卓著。

近年来，北师大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陆续完成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始终处于学科前沿。特别是崭露头角的部分中青年学者的作品，已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为了集中展示北师大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也为了给中青年学者的后续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我们组编了这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希冀在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力作。这些作品或为专题著作，或为论文结集，但内在的探索精神始终如一。

当然，作为探索丛书，特别是以中青年学者作品为主的学术丛书，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0年3月

自序

十几年前，在广西师范大学何林夏兄的鼓励下，我曾将当时的一批论文汇编成册，以《中华典籍与传统文化》为题出版。如今呈现给读者的这本小书，是我在上书出版之后，特别是2000年以来所发表论文的选编。

近十几年来，我的学术研究集中于三个领域。首先是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而且较多地关注于古代藏书史、藏书文化的研究。1993年，我所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成功立项，使我在此领域积累了较多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课题顺利结项后，于1999年出版《藏书与文化》一书，并陆续发表了一批有关藏书史和藏书文化的文章。当然，除藏书文化外，历史文献学的学科理论、古代历史文献学思想、中国古代出版史等方面也是此期曾关注过的问题。

1996年，我师从吴怀祺先生攻读史学史专业博士。因本单位出于对研究元代文献、元代文化的需要，我以元代史学思想作为选题，并由此开始了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史学思想领域的探究。其实，历史文献学和史学史两个领域本就密不可分、互相关联。白寿彝先生在谈到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时说，“史学史的对象包括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著的研究和历史文学。”^①而反过来，历史文献学研究也包括了史部文献的编纂、注释、考辨、流传的历史。因此，在此之前我也曾涉及史学史领域，发表过文章，但是文献学重考据，史学思想重思辨，它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这就必然有一个思维定式的转换。怀祺师不弃愚钝，谆谆教诲，引导我开辟了史学思想、文献学思想研究的新领地，发表了一些有关史学思想研究的论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5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

文。此外，这一阶段由于本单位科研方向的需要，我以元代史学为阵地，研究触角也涉及了元代文献、元代文化和其他元史的一些内容。

1998年，我敬爱的业师刘乃和教授不幸逝世。为了继承她的遗志，近十年来，我在陈垣研究这一领域投入了较多的力量。陈垣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研究陈垣的事迹和学术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继承陈垣史学遗产、弘扬他的优良学风，推进新时期史学发展的现实需要。2000年、2002年，我和王明泽、邓瑞全两位老师合作，先后撰写、编纂了《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上下册)和《陈垣图传》；整理出版了先师刘乃和先生的遗著《陈垣年谱·陈垣评传》；此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陈垣史学的论文，庶几完成了先师的遗愿。不过我知道，这距离老师的高要求还相差很远，在陈垣研究领域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

以上三个领域的工作归结起来实际是两个方面，即中国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十余年来，我因这两个方面的探索，陆续发表了80多篇论文，现从中选出与两大主题相对切合、各专题分布又相对均衡的近30篇，汇成本集。分上、下两编，上编即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文章分两组，一组是有关历史文献学理论方面的思考，着眼于新世纪历史文献学学科的建设、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及文献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另一组是关于文献学史的论文，主要是藏书文化方面的研究，也涉及对中国古代出版史的探讨。下编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也有两组论文。一是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讨论，尤其侧重于元代史学，如对许衡、郝经、虞集、苏天爵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的分析。二是从史学史的角度论述当代史家陈垣、白寿彝、刘乃和等先生的史学成就。其中关于陈垣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观、优良学风及晚年史学的阐释，反映了本人近些年来对陈垣史学更为深入的认识。

十几年前我在出版《中华典籍与传统文化》一书之后，就常怀惴惴不安之心。如今编选这本小书，心情依然不显轻松。因为总的看来，还是精品不多，有愧于师友的期盼。时光如梭，可叹书生老去，岁月蹉跎！然而学问之事，未有止境。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①夫子斯言，今后当如晨钟暮鼓，催我努力。感谢我校历史学院杨共乐教授对我学术研究的关心和支持，感谢学校出版社李雪洁老师对本书的辛苦编校。同时，也要感谢在本书编辑过程中，一批年轻朋友对我的帮助。

不揣谫陋，谨呈学界同行及读者诸君，期望不吝赐教。

^① 《论语·泰伯》，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目 录

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1
经学与文献学的关系	8
新世纪古文献学研究的交叉与综合	12
古代类书的起源与发展	23
魏晋南北朝的图书出版事业	34
清代私藏书目知见录	47
古代私家藏书的类型	83
古代私家藏书楼的构建与命名	98
古代私家藏书措理之术管窥	106
论社会政治环境与藏书盛衰	115
学术文化风尚与典籍传藏	125
文化情结：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心态探微	134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论纲	147
古代史学的丰富遗产	156
评《左传》解《易》——看易学对先秦史学的影响	166
许衡历史思想探究	175
郝经史学思想探究	189
虞集的史学思想	199
苏天爵的文献证实思想	214
元朝的开放意识与域外史研究	223
陈垣史学的“记里碑”——再读《通鉴胡注表微》	241
陈垣的避讳学研究——论《史讳举例》的历史文献学价值	254
陈垣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观	264
陈垣晚年史学及学术思想的升华	277
陈垣：20 世纪的历史考据大师	290
学习和发扬陈垣先生的优良学风	299
自得、创新与建树——读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论集》	304
当代史学理论的财富	308
弘扬励耘精神 开创史学新风——浅谈刘乃和先生的史学成就	313

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思考^①

新世纪之初，对新中国史学的成就与未来进行思考和研究，非常必要。目的在于回顾过去，总结经验教训，展望新世纪我们学科的发展，以求开辟新的天地。遵循这样的主题，本文拟就 20 世纪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发展的辉煌成就和存在问题以及 21 世纪历史文献学发展的方向作粗略的探讨，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20 世纪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与不足

白寿彝先生说：历史文献学是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按照他的总结，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实际工作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时代，然而真正建立起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即 1928 年由郑鹤声、郑鹤东兄弟撰写的《中国文献学概要》。与此同时，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在开展史学研究的同时，集前人及自己文献考据的实践经验，用科学方法系统总结为各门具有法则和范例的、可供传授、便于研习、操作和成长的专学，其中校勘学、避讳学、史源学等最为典范，从而不断扩展了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内容，为历史文献学不断充实完善奠定了基础。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历史文献学迎来了第二次发展完善的高峰。在学科建设方面，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在 1982 年出版，二书在数十年文献学发展积累的基础上，对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类书、四部书、丛书、辑佚、辨伪等作出了较系统的梳理，建立了较为系统完善的文献学学科体系。与此同时，许多专家、学者对文献学学科涉及的对象、目的、内容和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尤其是白寿彝先生，更是对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发展历史和分支学科的建立，在理论上构建了运行系统的框架。他认为历史文献学分为理论、历史、分类及应用四个部分，其中理论部分包

^① 本篇与首都师范大学陈晓华合作，谨致谢忱。

括：历史和历史文献的关系、历史学与历史文献的关系、历史文献作为史料的局限性、历史文献的多重性、历史文献和有关学科等问题。^①另外，白先生还谈到了研究历史文献学的意义，以及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等问题，^②为历史文献学建构了理论框架。在文献整理实际方面，除整理出版了数千种古籍单行本外，更有一些超级大工程令世人瞩目，50年代以来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标点就不用说了。自80年代以来，更有号称“十全大补”的古籍整理点校工程，其中包括全宋文、全宋诗、全辽文、全金文、全元文、全元诗、全明文、全明诗、全清词、清文海以及全唐文续补。近些年又出现了以选辑、影印为主的四库系列丛书，如北大的《四库存目丛书》，上海图书馆等单位编辑的《续修四库全书》，王钟翰的《四库禁毁丛书》，还有《四库未收书丛书》等。

总而言之，20世纪文献学在学科建设和实践工作上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无愧于先人、无愧于时代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肇始于80年代的文献学第一次发展热潮，在90年代逐渐没有了后劲，其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文献学本身而言，我们认为存在两个方面的“脱离”，从而局限了文献学的纵深发展和广泛发展。

第一，文献学研究脱离了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和交叉研究。举与文献学最为切近的史学、考古学为例，20世纪下半叶，地不爱宝，大批的考古文物和地下文献被发掘，改变了以往人们在文献学中的一些传统看法。比如，辨伪学方面，历来被疑为伪书或以为不存在的《孙臬兵法》《尉繚子》《晏子春秋》，通过1972年的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证明确有此三书；比如近些年大量战国简（如较近的郭店楚简）、秦简、汉简、三国简等的出土，竹简的制作体制，即长宽、个简的字数、编连的形式已经非常清楚，然而各种文献学著作或教材，均未对所收各期竹简书的体制作系统清晰的总结。又比如简帛书在中国历史上流行使用的时间与文献学论著中关于简帛书史的论述出入很大，历来文献学叙述文献发展史，总是认为自东汉蔡伦以来，纸的使用逐渐普及，三国时纸写本已较多，可能还有一些帛

① 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见《白寿彝史学论集》，558～55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1994。

② 同上书，567页。

书，竹简的使用应该很少了。然而，前些年长沙走马楼 10 万多枚三国简的发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三国时期，竹简的使用量还是很大的。如此等等，20 世纪以来这些重要的发现和新的信息，我们文献学论著或者教材，几乎少有涉及。1993 年发现、1998 年正式公布的“郭店楚简”，使我们知道《老子》书的源头至少有三种，郭店楚简本《老子》、传世本《老子》和马王堆帛书本《老子》，它们在内容和编排上都存在极大差异，然而这只是一些搞思想史的、考古学的以及古文字的学者在进行对比研究，而搞文献学的却涉猎极少，极少利用新发现。

第二，文献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生活严重脱节，很多经济方面的、科技方面的古代文献等待我们去研究。这些姑且不论，就是与我们学科比较接近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实际，联系的也甚少。比如，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书文化持续升温，买书、读书、藏书、出书，这些都与我们的学科相关，如何总结古人爱书、惜书和治学的精神，如何总结中国古代出版事业的成就和经验，这对于书文化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历史文献学专业的研究者可能做得比较少，很多是图书馆学专业的去做。此外，20 世纪末以来，我国出版业发展迅猛，目前全国有 600 多家出版社，每年新出版图书 8 万多种，图书市场极大。那么，在出版史方面，我国古代的出版业有什么优良传统，有什么可供借鉴和吸收的遗产和经验，这些都值得总结。最近国家出版总署组织的一个重点项目《中国出版通史》，准备对出版事业作一个全面的清理，其中要讨论什么是出版、中国古代什么时候有了出版、何时有了雕版印刷技术，这些关乎我们出版事业的实际问题，我们文献工作者理应率先关注，但我们似乎做得很少。

二、21 世纪中国历史文献学展望

进入 21 世纪，中国学术在以前发展的基础上，正面临新的开端、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历史文献学如何不负厚望，持续发展。我们认为，应该在抓好学科各方面的基础工作外，克服以往的不足，处理好四个方面的结合。

（一）促进文献学研究与出土文献研究的结合

1. 开展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较研究，无论从内容、体例，还是产生、流传的时间，甚至关于字体、简帛的形制等，都应该通过有关比较，改变或增添文献学的内容。从银雀山汉墓到马王堆汉墓及郭店楚简，都有大批出土文献能与传世文献相比较，如《孙臆兵法》《尉繚子》《晏子春秋》《周易》，郭店楚简的《老子》《礼记·缁衣》《五行》都可与马王堆的帛书本、传世本，或上海博物馆整理出版的战国竹简本，进行比较或校勘，从而整理出更符合古书原貌的典籍。

2. 历史文献学要开辟新领域，创建新的分支学科，加强对出土文献的研究。自居延、敦煌汉简出土以来，出土的档案文书逐渐增多，前几年出土的长沙走马楼三国竹简 10 万多枚。最近又传来消息，2002 年 6 月湖南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又出土大批秦木简达 3 万多枚，是秦始皇时期的县府档案，非常珍贵，有专家称，据这些材料可以改写秦史。比如，竹简中有“洞庭郡”的记载，由此可以了解秦始皇设置 36 郡后，秦郡又逐渐增加的具体情况；另外，竹简中还反映了大量秦代行政、邮传、经济方面的信息，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历史文献学学科应该建立古文书学学科，运用古文书学的方法，对简牍的书写格式、内容类别、收发渠道、档案功能、时间地点和简牍形制等做深入、系统的研究。

（二）文献学要与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相结合

众所周知，文献的产生、聚散，文献学的发展是与社会发展、社会的历史文化发展密切相连的，因此，文献学史的研究如能与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相结合，会相得益彰，有利于加强文献学史研究的分量。比如，有些学者近些年所做的古代和近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如黄建国、高跃新主编《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中华书局 1999 年版）、周少川《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现代出版社 1999 年版），就是文献学研究与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结合的典型。他们的成果，“视野开阔，整体关照，都将藏书视作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并将其置于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探讨。着眼点虽在藏书，但目光却是整个社会文化风气的深层变迁，这种文化视角的采用是自觉的，比如后两书都在卷首的绪论中对以前的研究工作

进行总结，然后解释采用文化视角的必要性。这种探讨角度的转换无疑对中国藏书文化会有更新更深入的认识”^①。其中《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一书更是体现了文献与社会史、文化史相结合的道路，它“将私家藏书视为中国古代一种内蕴极其丰富的文化现象、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自觉采用文化的视角”，其研究角度的变化“必然会带来观点的变化，以前司空见惯的现象就此获得新的意义和价值，比如作者对古代私家藏书与社会历史环境相互关系的论述，这一问题以前涉及较少，作者结合丰富的古代藏书史料，详细论述了政治经济条件和学术文化演变对藏书文化的深远影响，探讨了北风南移和私家藏书文化中心的转移……对古代藏书楼、藏书章、藏书习俗、藏书嗜好等问题，以前只是作为典故趣话来谈论，但在作者眼里，它们都是古代藏书家文化心态的生动见证，对于揭示他们的文化心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果不是文化视角的采用，是不易发现这些问题的重要价值的”^②。由此可见，走文献学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相结合的道路，将是有源之水。

（三）文献学研究要与学术史研究紧密结合

以往文献学只顾讲校勘学史和注释学史，学术史只顾讲主观分析，各讲各的，成为两条道上跑的车。李学勤先生对学术史这种状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学术史不仅要从思想、义理的角度去写，还要从文献、史实的角度去写，两者不可偏废。^③ 这种看法极其重要，从文献学的角度上，就要看各个时代的各种经典的注释、校勘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从校勘注释的内容看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看学术史的转变。不同的版本反映了不同的思想和学术，文献学应该在这方面作出学术史的说明。另外，李先生还谈到学术史研究中的史实说明，这就是要对学术史上学术产生时代、发展阶段，尤其是对不同学派形成发展进行说明，《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实际上就是学派史，这方面的研究和陈述不多。李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史》11卷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陆续出版了，我们期待着从中得到文献学

① 淮茗：《中国藏书文化研究的新收获——评三部新出版的中国藏书文化论著》，载《中国图书评论》，2001（2）。

② 同上。

③ 易丹：《李学勤谈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载《中华读书报》，2001-08-15。

史和学术史研究结合的启示。

(四)要结合开展深入的专学研究

1. 开展专体文献的研究。这包括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以及其他史籍的专体研究，如王锦贵对纪传体文献进行研究的成果《纪传体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便是典型的范例。

2. 专学研究。中国历史文献学史的专学范围甚广，既可有中国历史文献学本身的专学研究，也可包括历史文献学的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这些学科的研究，有的可以从整个学科的研究来进行考察，有的可以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范围更小一点，可以考察某一个断代的专学发展史。专学研究主要包括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辨伪学以及辑佚学等研究。这些专学研究都可以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一方面深化以往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开拓新的生长点。比如，在目录学方面，应考虑如何利用互联网，联合各地图书馆收藏的古籍目录，形成全国现存的古籍全目。在目录学研究，无论是方志目录、书业目录、私家藏书目录，还是未被深入开掘研究的领域，都应该有纵深的研究。另外，在运用方面，如何利用古籍目录来校勘、鉴定、考辨和整理古籍；如何利用古籍目录来进行学术史的研究，目录学也应提出新的设想和导向。在校勘学、辨伪学方面，校勘思想、辨伪理论的系统研究也还很薄弱，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3. 专书研究。专书的流传考订为学术史奠定了基础，因此专书研究需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其作整体研究。要从卷帙的分合、内容的变化、书目的不同著录以及注释内容的发展，考察某些重要专书在各个时期的流传过程中所带有的时代特征，考察某些重要专书的传注、笺疏在学术思想上对原有著作的延伸和发展，为人们提供可资借鉴和利用的材料，对学科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并从学术史的角度总结这些专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以及达到的水平，为中国学术史增添新的内容。

4. 专人研究。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人的活动而已。”^①人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历史的主体，因此在历史研究中，人物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也应重视专人研究，对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18～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史人物、专业人物进行专门研究，如对历史文献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刘向、陈垣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专人研究其中又包括历史文献学的学派研究，最近，柯平在《论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流派》^①一文中将文献学派分为：校雠学派，包括版本校勘学、全面校雠学、义例校雠学、考证学、辨伪学；目录学派，包括藏书目录学、史志目录学、佛藏目录学、版本目录学；广义校雠学派，包括正义和文献编纂整理两大类。柯文的分类，且不说按校雠学派、目录学派或广义校雠学派区分是否合理，校雠学和广义校雠学派如何区分，就以所分的史志目录学、版本目录学和校勘学、考证学、辨伪学来看，实际是一些分支学科，并无学派特征。学派的形成，必须有追随者和权威影响人物，有学派称异于其他学派的学术路线和研究方法，还有一个集结在共同学术路线下的队伍。如《宋元学案》中：“晦翁学案”即晦翁学派，讲朱子理学的朱熹学派；“象山学案”即象山学派，讲陆氏心学的陆九渊学派。由此观之，柯文的分列，似乎还不能称学派。至于如何区分，留待它文探究，这里想要说明的是，文献学学派的研究是我们今后特别要注意的路径。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历史文献学学科的建设任重道远，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既要传统历史文献学史作深入开掘，如对出版史、藏书史、目录学史、断代文献学史做深入挖掘；又要集中力量探讨跨学科研究。只有注意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才能充分发挥文献学的学术作用，同时也为学科本身的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开拓更为广阔的前景。

^① 柯平：《论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流派》，载《郑州大学学报》，2002(2)。

经学与文献学的关系

经学与文献学从来就是一对联系密切、互为依存、发展的学科。可以说，文献学是经学发展的基础，而经学发展的需要又促进带动了文献学的不断进步。周予同先生曾经指出：“经学与中国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关系较大，不懂经学而要研究这两门学问，往往会出问题。目前有些著作存在问题，往往因为中国文献学的底子不厚，而经学是文献学中最基本的部分。”^①这段话既说明了经学对研究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性，也说明了经学与文献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首先，文献学是经学的基础，中国古文献学的训释、考辨、校订之功在经学的产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是儒家的始祖，是中国经学的开创者。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说：“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按照《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六经正是通过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序易传、修春秋等一系列文献整理、疏通工作而确定下来的。孔子之后，他的弟子、后学在传授经学的过程中，继续运用文献学的方法校订、诠释和整理经典。《吕氏春秋》的《察传》篇就记载了子夏校改“晋师三豕涉河”，以“三豕”为“己亥”的故事，这是校勘史上校正因字体形近而误的典型事例。秦火以后，六经有的残缺不全，有的处于自流分散的状况，内容参差不齐。然而在汉初文景二帝的搜集，尤其是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之后，经过各派经师的整理、诠释、传授，以及官方的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熹平石经刊正，五经经典的文字内容得以校订，经学典籍不断丰富，还形成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两大学派，经学在汉代繁荣起来。经学从秦火的凋敝到两汉的繁荣，离不开经学家们运用文献学手段，对经典的收集整理、校勘和诠释。

不仅秦汉经学的变化发展是如此，一部中国经学史，也不外是对经学文献不断校订、考辨、诠释的历史。这样的文献整理诠释并不是简单重复的过程，而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比如，曹魏时的何晏、王弼汲取老庄思

^① 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序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